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文集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红旗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6

ISBN 7-5051-1413-1

I. 马…

II. 北…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333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责任编辑:肖景华 装帧设计: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bs@publica. bj. cninfo. net

编辑部:84049774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2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480千字

ISBN 7-5051-1413-1

定价:48.00元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

(代 序)

龚育之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这不能算是哪个个人的创见,恐怕是理论界的共识,不过有些研究者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更加明确地把它提了出来,我也赞成这个意见。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20年代苏联给列宁主义下定义,出现过两种意见,一种强调俄国性,另一种强调时代性,展开了一场争论。斯大林强调时代性,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开阔,单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把列宁主义的意义给限制了。列宁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帝国主义,出现了世界战争,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的。列宁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这个变化下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一条,也没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解决那个时代下俄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应该既看到时代的变化,又看到同俄国情况、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应该把这两点都突出出来。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

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够、善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没有变化:我们中国正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之中,全球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果从东方的角度来看,把中国抗日战争看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那么也可以说:我们那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之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情况不同了,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单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十四大报告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讲了当代化和民族化两个方面。“时代特征”这几个字写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实际”前面加个“当代”也非常重要。这个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提法,成了规范的提法,已经写进十五大和十六大党章。

二

我们知道,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转向胜利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个确立只是开始,到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以后,逐步调整军事指挥,克服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干扰,加强中央领导,完成对政治路线的清理,进而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路线上来,开始了国共合作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这条路线又受到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从右的方面的干扰。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克服这个干扰,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这件事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就是由毛泽东来作的。在这个报告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一节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

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8页)

这样一篇讲话,是很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针对30年代在中国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它的许多先驱者、它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最主要代表著作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但是这个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确倾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和发展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了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了解必须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当做教条,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从国外来的指示。这后一种倾向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挫折,危害时间最长最严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先是“左”倾后又转为右倾的教条主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到普遍的赞成,启动了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自觉。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总结建党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1940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在这些论述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全党所接受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充分地、强有力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其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

建国以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出版说明中特别声明:“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在收入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改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逢先知同志曾撰文说明,这个修改是“毛泽东亲笔”所为。

怎样看待这个修改?冯蕙同志和鲁振祥同志有专门研究。冯蕙的《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发表)和鲁振祥的《〈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现已发表),详细引证了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界接受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主要情况,分析了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修改这个提法的国际背景,鲁振祥的文章还特别注意到建国初刘少奇将他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加以修订,改题为《论党》,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些提法并没有修改。当然,刘少奇对修改党章报告的修订在前,毛泽东编选集做修改在后。

逢先知、冯蕙、鲁振祥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拥有查核党的历史文献和手稿的便利,所以他们的叙述是有权威性的。他们都认为,我也认为,编辑毛泽东选集时的这处修改,是由于外国的影响在当时形势下所做的纯粹文字上的修改,以及精益求精的更加细致的表述,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一如我们党一度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但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再次把它写在八大的党章中一样。

60年代中苏论战,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这也是鲁振祥研究的发现。据他介绍,吴冷西在《十年论战》这本回忆录中说: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接到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少奇同志过去在讲到毛泽东思想时曾经说过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苏共《答复信》不指名地攻击少奇同志,说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这显然是他们知道少奇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会议后有意的挑衅。”据鲁振祥的推测,当时苏共答复信的起草人大概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是毛泽东,他们可能以多次印刷的《论党》一书为根据,认为这个提法的提出者是刘少奇。鲁振祥还介绍:毛泽东1961年

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由此而又一次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因为苏共方面的矛头是具体指向刘少奇,所以毛泽东还风趣地讲到“版权”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讲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

鲁振祥所介绍的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这番谈话,吴冷西的书中也有所记载。

60年代的中苏论战情况复杂,双方各个论点的是非,我们这里姑置勿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还说: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党大国主义。如果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进行指责。邓小平说:“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由此可见,指责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涉及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应该认为是一个原则是非的问题。

四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最先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论断的出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深刻而展开地论述了这“两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用什么语言来概括为好呢?

我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一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有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后来又出现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提出过“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页)。事实上从这时起,从《论十大关系》和八大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新的开始,如果探索顺利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应该从那时算起。因为新的历史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了嘛!然而,那个探索走了大的弯路,发生了“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失误,所以不能说“第二次结合”、“第二次飞跃”已经实现。不过,从1956年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进程的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党的领导层和理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重新起了头,奠了基,开了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着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前一个名称是以其主要创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后一个名称是以其理论的主题命名的。自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理论界用得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成就,真正是举世瞩目。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党的十六大把它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进了党章。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三大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个成果。一次历史性飞跃,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是很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课题。解决了这样的历史课题,才算实现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通常都是说这样三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的,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二段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在第三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

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继续推进着的过程。十六大以后,这个历史进程仍在延伸和深化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

五

在人们的印象中,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又频频出现,回到理论界注意的中心视野里来。

应该说,实际上,本来我们也没有放弃过这一提法,而主要是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并用,更多的时候是用后面这个提法。但是,为什么给人们以那样的感觉呢?

请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写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其中提出了一个新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定义还写进了九大的党章。这里倒是强调了时代性,至于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否合乎实际,又当别论。单从它离开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来谈马克思主义,就会带来并且的确带来了思想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否定和摒弃了林彪那个定义,重新认识和定义毛泽东思想,回到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回到七大刘少奇论述的轨道上来。这个回归,自然也就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上来。这个简洁通俗的提法有它不可代替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先是在理论界的文章中广泛地用了起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在郑重场合的讲话里,比如:江泽民同志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和胡锦涛同志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讲话里,也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

当然,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讲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时还要加上同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不是单纯地回归七大,而是同七大的提法有所变化。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规范的提法的由来。

目 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代序)·····	龚育之(1)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	石仲泉(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鲁振祥(18)
试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刘洪新(37)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当代化:几个问题·····	王锐生(4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契合·····	侯治水(5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陶德麟(6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意义·····	郑德荣 王占仁(71)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汪 军(7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	关志钢 张立娇(86)
“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	赵 翔 田 川(96)
实事求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传平(101)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新成果·····	李启英(110)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庄福龄(119)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和主观条件·····	周向军(135)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杨宗丽(148)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叶海源(155)
毛泽东《兴国调查》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梁 柱(161)
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	蒲国良(169)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几点启示·····	于化庭(178)

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论任弼时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	张景荣(187)
党在建国后二十九年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李曙新(194)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雍 涛(204)
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开拓·····	曾长秋 王千慧(217)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白习凤(228)
“社会主义为主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吴桂芳(237)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	朱敏彦(246)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必然性·····	余金成(257)
从世界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念·····	徐崇温(268)
当代全球化的大趋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野·····	包心鉴(276)
全球化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徐艳玲(290)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赵小芒(299)
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何虎生(3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文化学解析·····	宇文利 赵存生(3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侯树栋(32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邱守娟(325)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	余品华(33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刘福同(347)
后 记·····	(36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提出较晚,但这个思想自党创立之日起,实际上已经孕育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首先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然后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 85 个春秋的基本历程,采用“数字化”方式表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二二三”: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

本文试图对这一历史进程作简要解读。

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五千年文明,并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一千五百年。但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人侵使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终于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

先是以李大钊、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始,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必须研究怎样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现实环境;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①。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努力掌握其“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国情,解读中国的历史传统,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即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对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问题都有初步认识,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派出不少重要干部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但是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没有能够抵御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党的进攻。这是党在大革命后期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在1927年8月以后,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后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那种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利用危急时刻在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革命的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造反上山,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但却有上千年的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那个时期的“左”倾领导人,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西学”,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却持否定态度。同时,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基于上述工业文明的革命理念而发出的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又盲目迷信,甚至顶礼膜拜,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城市武装暴动,还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燃起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时,他们还强行实施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方针,则是一种食“本本”不化的典型表现。他们不懂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中国革命不能不遭受严重挫折。

与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不同,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不仅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秋收起义队伍拉上

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后,转战闽西赣南,将发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创建了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不仅要强调井冈山斗争,还要强调以中央苏区为中枢的全国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开辟的。中央苏区有近6年的历史,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进行后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从时间来说,这个时期占民主革命的近四分之一,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艰难困苦的时间最长。(二)从内涵来看,它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探索,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孕育着飞跃。(三)从意义来讲,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犯了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受过排挤打击,但其间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最初雏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它磨砺和造就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人民军队经受了艰苦卓绝的锻炼。如果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际是从这里开始。党在这个时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而且为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开创了新的途径,初步地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锻炼了党的执政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广大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批判“左”倾错误领导,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获得历史性大飞跃的10年。在这个大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论,获得了四个最重要的成果,或者说经历了理论的四次提升。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要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

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势之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此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概念是等值的。或者说,后者是“学名”(标准称谓),前者是“小名”(通俗用语)。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新形势,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③。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这“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道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它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具有了完整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认识走向成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20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

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四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在抗日战争中,一方面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由于对过去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是非在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层领导中并没有统一认识,致使在一部分重要地区又发生新的错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达到一个新境界的理论提升运动。通过整风学习,批判指导思想发生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诸方面总结建党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全党更加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赞赏有加。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此为《决议》原文),以这个思想体系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有了《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在党的七大,全党形成共识,决定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④。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了。